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

黃 宗 昊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歷史制度論是一問題意識、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三者緊密結合的學派。研究者始自經驗的問題意識，欲解答大問題與真實世界的難題，並由此引導出特定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模式。在方法立場上，歷史制度論者同意質化研究的「因果過程模式」，並運用比較方法進行系統性、脈絡性的歷史過程分析。但歷史制度論者並未拘泥於質化方法的基本教義，面對量化陣營的質疑，反而持開放的立場並提出多元的回應方式。在理論建構上，歷史制度論者具有「中程理論」的共識，並從整體觀點和權力途徑探討制度運作，能結合不同「變」與「常」的成分，發展出各種有效解釋歷史過程的制度變遷模式，不致如理性選擇制度論般，對於長期歷史過程的分析流於線性、簡化。

關鍵詞：新制度論、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理論、質化研究、量化研究

* * *

壹、前 言

自從 March and Olsen 於 1984 年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以「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爲名的文章後，揭開了比較政治領域中「新制度論」研究熱潮的序幕。①在整個 1980 年代，以「新制度論」爲名的論文尚不太多；但進入 1990 年代後，新制度論的相關研究蔚爲顯學，以此爲名的文章約六成集中於此一時期，尤其重點在類型學的探討上。②從最簡單的只將各種新制度論

註① J. March and J.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1984）, pp. 734~749.

註② 如果運用「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搜尋以「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s）or neo-institionalism（s））爲題的研究論文，截至 2010 年 8 月 1 日會出現 126 篇，其中 13 篇出現在 1990 年以前，1991 年到 2000 年有 74 篇，2001 年以後有 39 篇。其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就是 March and Olsen 的論文，共 523 次。

分爲兩大類，到最複雜的洋洋灑灑列出了七大類，其中最廣爲接受的分類應該是 Hall and Taylor 的看法，將比較政治研究中的新制度論觀點大別爲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會學制度論（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類。③

進入 2001 年以後，以「新制度論」爲名的文章大幅銳減。究其實倒不是制度的研究領域不再熱門，而是隨著理論的進展，尤其是類型學分析達到一定共識後，學者們開始揚棄使用「新制度論」一詞。因爲此一名詞並非嚴謹的概念，除了代表一股學術風潮以及「制度引導行爲」的基本共識外，無法看出到底採用其中哪一派的實體主張進行探討，尤其各派觀點又存在重大差異，不精確的名詞容易造成混淆。

越來越多的學術討論清楚地以特定制度理論的觀點爲名，甚至以理論中的重要概念爲題，這反映出理論建構的深化。在各派制度理論中，尤以歷史制度論和理性選擇制度論帶給比較政治領域深刻的影響，如具有指標性的領域回顧專書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2002）就有兩篇專文分別探討歷史制度論與理性選擇制度論的進展。④一方面這是制度研究熱潮依舊的明證，但更重要的是表明理論發展已朝向更爲分殊化與細緻化的方向邁進。

在制度理論發展得欣欣向榮之際，卻有兩個現象值得憂心。首先是「歷史制度論」一詞有遭到濫用之虞。經驗研究的主題幾乎都有其歷史背景，且大部分比較政治的相關研究也或多或少有制度的成分，這使得許多無法提出明確分析架構的論文常含混地自稱是「歷史制度分析」，無視於一項重要事實：並非涉及制度與歷史的就是歷史制度論。歷史制度論有其特定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不應該是經驗研究的大雜燴或理論殘差項的垃圾桶。其次是中文文獻對制度理論的研究明顯不足。既有文獻大多是

註③　只分爲兩類的是：T. Koelbl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7, No. 2（1995）, pp. 231~243；分爲七類的是：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London: Pinter, 1999）；最廣爲接受的分類來自：P. Hall and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y*, Vol. 44, No. 4（1996）, pp. 936~957. 這篇文章也是前註 126 篇論文中，被引用次數次高的，共 453 次。其他較常被引用的類型學分析包括：Immergut 的論文 107 次、Lowndes 的論文 39 次、Kato 的論文 21 次和 Koelble 的論文 30 次等。參見：E.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26, No. 1（1998）, pp. 5~34；V. Lowndes, "Varietie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 Critical Apprais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74, No. 2（1996）, pp. 181~97；J. Kato, "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4（1996）, pp. 553~582.

註④　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自 1983 年起每 10 年出版一次政治學研究領域全面回顧的專書，均以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爲名，探討政治學界的研究進展。2002 年底是第 3 次出版，也是迄今最近一次出版，可參見：I. Katznelson and H.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其中討論歷史制度論的是 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p. 693~721；討論理性選擇制度論則是 Barry Weingast, "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 pp. 660~692.

運用制度理論所引導的經驗研究，對理論本身的討論多停留在類型學介紹的階段，在近十年來理論深化的進展中也甚少參與。⑤在各種制度理論中，尤以歷史制度論所引導的經驗研究最多，但被理論性探討的成果卻最少。⑥

這兩個現象之間又存在交互作用，進一步在中文學術界產生更不利的影響。由於中文文獻對制度理論的研究不足，使得經驗研究不易受到充分的理論指引，雖然宣稱是採取歷史制度論分析的文章大量出現，但其研究設計與分析架構往往只停留在粗淺的階段。當粗糙的研究充斥市面，容易讓人產生歷史制度論的經驗研究品質不佳的印象，久而久之，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連帶使得嚴謹的經驗研究亦難以立足，對於制度理論本身的探討又更將停滯不前。

何以中文文獻對制度理論的研究不足？這應該和歷史制度論的蓬勃發展以及經驗研究的大量出現有關。豐富的研究成果反而造成對理論走向的掌握不易，就如同枝葉過於茂密反而不易看清樹木的主幹。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對歷史制度論的理論脈絡作一番梳理的工作，藉由經驗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上的立場以及理論建構的模式等面向，勾勒出當前歷史制度論的輪廓，可作爲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引導經驗研究的指南。

本文認爲：歷史制度論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出自眞實歷史的問題意識引導下，從事理論建構，並有伴隨而生的方法立場，這和量化研究與理性選擇理論由特定的方法與理論立場出發明顯不同。歷史制度論的問題意識、方法立場和理論建構三者間嚴密結合成一整體，不僅可提供經驗研究充分的指引，且透過理論與方法間的相輔相成、互相啓發，更是歷史制度論不斷發展前進的內生動力來源。

在本文接下來的部分，首先討論何謂歷史制度論，其理論與方法有什麼特徵。除了和其他制度理論的簡單比較外，本文更著重說明歷史制度論的問題意識如何引導其方法立場和理論建構，使三者間呈現了有機連結以指引經驗研究的進行。緊接著分別

註⑤ 在中文期刊中，對新制度論類型學的介紹可參考：莊文忠，「制度的研究－『新制度論』觀點的比較與『後現代制度論』的發展」，**理論與政策**，第 16 卷第 4 期（2003 年 6 月），頁 15~44；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政治學報**，第 32 卷（2001 年 12 月），頁 95~170；郭承天，「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第 31 卷（2000 年 12 月），頁 171~201；謝俊義，「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與展望」，**中國行政**，第 68 卷（2000 年 8 月），頁 1~26。

註⑥ 在中文期刊中，對歷史制度論的理論探討只有兩篇。相較之下，對理性選擇制度論的探討篇數較多，內容也更深入。歷史制度論的部分參見：胡婉玲，「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6 卷（2001 年 12 月），頁 86~95；曾建元，「歷史制度論探原」，**世新大學學報**，第 11 卷（2001 年 10 月），頁 195~206。理性選擇制度論的部分參見：林繼文，「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模式」，**政治學報**，第 32 卷（2001 年 12 月），頁 61~94；林繼文，「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叢**，第 25 卷（2005 年 9 月），頁 67~104；陳敦源，「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3 卷（2001 年 8 月），頁 129~184；陳敦源、吳秀光，「理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控遊說』：William H.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回顧與評述」，**政治科學論叢**，第 26 卷（2005 年 12 月），頁 175~221。

對方法立場和理論建構進行探討，並和不同觀點進行比較與對話。就方法立場而言，歷史制度論主要是落在質化的一方，但面對量化陣營的挑戰，歷史制度論者卻不墨守成規，反而採取了開放且多元的方式回應。就理論建構而言，歷史制度論的目標是發展有效解釋歷史過程的制度理論，但部分理性選擇學派的研究者對於解析歷史亦有興趣，如何區隔兩者，並超越以往探索歷史過於線性、簡化的窠臼，是本文特別要說明的。本文最後則提出對歷史制度論發展的綜合觀察作爲結論。

貳、類型學分析與歷史制度論之界定

在探討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之前，要先回答一個更爲根本的問題，即：到底什麼是歷史制度論？歷史制度論的特徵爲何？在早期 Hall and Taylor 有關類型學的經典論文中，透過「制度與行爲間的關係」和「制度形成與變遷」等兩個面向，將新制度論區分成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制度論和社會學制度論等三類，論點可簡單整理成表 1。

從 Hall and Taylor 有關「制度與行爲」的說明可看出歷史制度論兩個清楚特色，其一是制度與權力間的關係密切，制度架構很大一部分就是權力鬥爭的產物；其二是在宏觀（文化／結構）與微觀（計算／行動者）的兩端中，歷史制度論並沒有固定的立場，保留了分析上的彈性。但就「制度形成與變遷」的課題而言，Hall and Taylor 雖已提到「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和「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 等歷史制度論常見的分析概念，但根本問題則簡單帶過，對於要如何運用制度理論解析歷史過程未有太多著墨，也沒有清楚說明制度與時間的關連性。可說在 Hall and Taylor 的類型學分析中，歷史制度論所呈現的面貌是制度有餘，但歷史不足。

對於早期的類型學分析，Thelen 評論指出：⑦以往許多的制度論文獻，無論是從功能／效用 (functionalist/utilitarian)、文化－社會學 (cultural-sociological)、權力分配 (power-distributional) 的角度看待制度的作用，對於制度變遷的課題所提出的都只是「常因性」(constant-cause) 的解釋，並未充分考慮時間的因素。⑧這些文獻常常想當然爾的認爲當制度所履行的功能、所體現的詮釋或所保持的權力結構發生改變，制度就會隨之崩解，忽略了制度的作用會與時俱進，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調整的事實。況且制度變遷也有多種形態，並非只是簡單的創設／毀滅二分而已。換言之，對於制度變遷的常因性解釋過於簡略，無法有效說明制度變遷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註⑦　K.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4~217.

註⑧　Stinchcombe 將因果解釋分爲「常因性」(constant-cause) 和「歷史性」(historicist) 兩種，常因性解釋意指不考慮時間因素所做的分析，歷史性解釋則是納入時間考量所做的分析，參見：A.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8), pp. 101~104.

表 1　各制度理論之內涵

類型／理論面向	制度與行爲間的關係	制度形成與變遷
理性選擇制度論⑨	採取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觀點，人會極大化自己的利益並和他人產生策略性互動。制度外生於人的行爲，是人爲創設的，以侷限人們策略互動的範圍，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制度起源於人爲有意的創設，可降低行爲者間互動的不確定性。制度創設往往涉及相關行爲者的主觀同意，既有制度能存續是因其較替代者能提供行爲者更大的價值。
社會學制度論	採取文化途徑（culture approach）觀點，人會儘量符合社會正當性的要求以搏取社會認同。制度內生於社會文化中，提供了何謂「正當」的意義參考架構與行爲規範，以引導人們生活。	制度來自於文化，來自於一先前即已充滿各式制度的社會中，行爲者藉由制度實踐認知甚至界定社會文化本身。行爲者採取新的制度實踐是因其可增加本身的社會正當性。
歷史制度論	在計算途徑與文化途徑中採取折衷立場，特別強調制度和權力分佈間的關連性。制度是鑲嵌在政治體系或政治經濟中，引導行爲者互動的正式／非正式的程序、慣例、規範、協定等。	制度亦來自於一先前即已充滿各式制度的體系。特別強調歷史過程中，特定轉折點（尤其是權力結構改變）對制度所造成的非預期結果和制度本身所產生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的效果。

資料來源：Hall and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p. 936-957；表格爲筆者自行整理。

之後的研究者更加意識到先前類型學分析的不足，並隨著以「歷史制度論」之名但卻缺乏嚴謹分析架構的作品不斷湧現，對於進一步說明「何謂歷史制度論？」此一根本前提的需要日增。在 Pierson and Skocpol 指標性的回顧文章中，就歸納了歷史制度論者的共同特徵爲：關注大問題和眞實世界的難題、認眞地處理時間過程，並分析脈絡中的制度。⑩其中第一點是根本的問題意識，接下來的兩點則是伴隨而來的理論與方法實踐。

歷史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多半來自眞實的歷史經驗，例如革命爲何會發生？民主與獨裁的起源爲何？福利國家體制如何演變？……等，試圖探索這些「眞實世界的難題」(real-world puzzles)。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清楚指出，歷史制度論者感興趣的「大問題」(big questions)，就是那些非專研此課題的研究者也認爲重要的根本問題。⑪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深深影響了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可參見圖 1。

註⑨　理性選擇制度論包括實證政治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部分。Hall & Taylor 此處所指的理性選擇制度論主要是根源於實證政治學的部分。

註⑩　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p. 695~696.

註⑪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 and Agenda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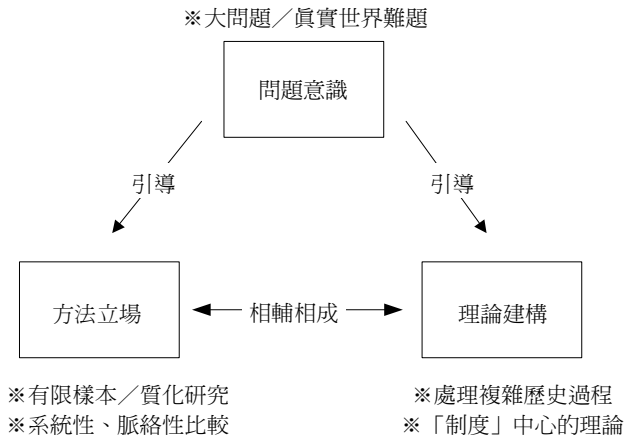

圖 1　歷史制度論的問題意識、理論與方法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就方法而言，因爲歷史制度論者感興趣的課題多來自歷史的眞實經驗，但曾經發生過的革命、大型戰爭、國家建立、……等的事例數量有限，甚至有許多是獨一無二的過程，如工業革命、資訊全球化、……等，在有限樣本（small-N）的侷限下，使得歷史制度論者偏重運用質化方法進行研究，較少採用需大量樣本（large-N）的量化方法。進一步而言，歷史制度論者關注的是解答眞實世界的難題，這需要清楚掌握歷史事例的來龍去脈才能辦到。此種關注「如何」（how）的問題意識，也讓以變項（variables）分析爲中心的量化方法難有用武之地，因其所能提供的過程資訊極其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採用系統化與脈絡化的比較方法，對歷史過程進行深度考察，這也成爲歷史制度論者最重要的分析策略。

就理論而言，既然歷史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來自歷史，他們也深知眞實世界的複雜性與動態性，要如何從歷史過程中歸納出理論，並有效解釋歷史過程的變動不羈，而非只是淪爲描述性的說故事，歷史制度論者將理論建構的重心放在具有複合作用的「制度」身上。制度一方面是文化與權力結構的具體呈現，又引導了體系中行動者間的互動，介於宏觀與微觀之間，具有分析上的彈性，因此成爲歷史制度論者理論建構的主體。歷史制度論者關注大問題和眞實世界難題的問題意識，也就轉換成在歷史過程中，制度如何起源與變遷的理論探索。如何超越前文所提常因性的解釋，發展出能有效說明歷史過程的制度理論，就成爲歷史制度論者從事理論建構的目標。

既然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都源自共同的問題意識，可說是一體的兩面，理論與方法遂相輔相成、互相啓發。對有限個案的深入探索與比較的分析策略可釐清複雜的歷史過程，找出在歷史過程中發生作用的制度機制，引導了理論的建構。理論的進展又推動了研究設計更爲精進，提升了脈絡性比較的有效性，進一步帶動了質化研究的發展。所以歷史制度論的問題意識、理論與方法嚴密地結合成一完整的整體，有效地引導經驗研究的進行。由此也可看出，並非涉及歷史或制度的研究都理所

當然的可歸入歷史制度論的範疇。

核心原則的確立有助於學派的凝聚，問題意識、理論與方法的緊密結合構成歷史制度論的獨特性。儘管如此，不同學術陣營在理論與方法上的不同實踐也使歷史制度論者持續面臨挑戰與質疑。在方法立場上，量化陣營主張運用大量樣本方能有效推論，質疑歷史制度論者僅用有限樣本是否能建立堅實的因果推論；在理論建構上，理性選擇學派運用演繹式的「制度設計觀」可簡潔有力的解析歷史，是否相較於歷史制度論者歸納出的制度理論更能有效解釋複雜的歷史過程？量化陣營及理性選擇學派不同於歷史制度論，並非由問題意識引導理論與方法的發展，但其有關理論與方法的主張已對歷史制度論構成重大的挑戰，如何基於自身特色有效回應，已成爲歷史制度論者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以下分別由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的面向，說明歷史制度論如何與量化陣營及理性選擇學派進行比較與對話。

參、方法立場：質化 vs.量化

在比較政治領域中，質化與量化的方法之爭已是論辯迄今的老問題了。但由於歷史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與方法實踐主要落在質化的一方，面對量化陣營有關「少量個案無法建立堅實因果推論」的質疑，此派學者勢必得在論爭中發聲，說明並捍衛學派的方法立場。既然有關歷史制度論者方法立場的討論，鑲嵌在長期論爭的脈絡中，簡要說明論爭的本質有其必要；而歷史制度論者面對量化陣營質疑的回應不只一端，呈現多元且開放的立場，這和歷史制度論本質上是由經驗的問題意識所帶動的研究密切相關。

一、兩種因果模式

質化與量化的長期論爭其來有自，關鍵在於兩派學者對於因果關係的本質與研究的重心有著極其不同的看法。量化陣營的學者主張要以大量的樣本爲基礎方能建立有效的因果推論，但在處理大量個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流失許多有意義的脈絡資訊。⑫質化陣營的學者則主張堅實的因果推論無法在缺乏脈絡的基礎上成立，但在強調

註⑫ 量化陣營的觀點可以 Arend Lijphart 的看法爲代表。Lijphart 認爲，要建立堅實的因果推論有兩種方法，一是對研究條件進行控制的實驗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另一是運用大量樣本的統計方法（statistical method）。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很難進行條件控制，實驗方法幾乎無用武之地，只能從統計方法著手；但以各國爲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又常碰到研究個案不足的困境，此時只好運用特殊的研究設計－亦即「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設法導出較有說服力的因果推論。如果樣本數足夠，仍以採用統計方法爲佳。參見：A.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1971）, pp. 682~693；A. Lijphart,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2（1975）, pp. 158~177. 前述此種研究個案不足的困境常被稱爲「small-N」的問題，即欲探討的變項（variable）多於欲研究的個案（case），使得個案的差異不足以解釋變項間的變異。

脈絡重要性與保留大量過程資訊的同時，只能對有限的個案進行探討。⑬

進一步將質化與量化的論爭拆解成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欲探討的樣本數量是大量還是有限，另一面向則是欲保留的過程資訊是簡約還是複雜，將兩個面向結合起來可繪成圖 2。量化陣營欲探討大量的樣本，但能保留的過程資訊相對簡約，其方法立場位於圖中的右下方，本文將其稱爲「因果要素模式」(casual factor pattern)。質化陣營尤其是歷史制度論者欲保留複雜的過程資訊，但能探討的樣本數量相對有限，其方法立場位於圖中的左上方，本文則將其稱爲「因果過程模式」(casual process pattern)。

「因果要素模式」是將影響歷史發展的要素抽繹出來，提煉成一個一個的自變項與應變項，最好還能用數字加以精確衡量。此種作法的優點是標準化便於操作，有助於分析大量樣本；但在將歷史轉換爲變項的過程中，會大量流失有關脈絡性和歷史過程動態性（如行動者間的策略互動）的資訊，使得因果解釋呈現的只是變項間的互動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靜態分析。

「因果過程模式」則是回到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去觀察各個因素在不同時點的互動，尤其著重呈現整串因果鏈（casual chain）如何影響結果，產生各種不同路徑（path）的過程。此種分析可保留歷史過程中大量的動態成分（如各種機制的作用如何隨著時間發生改變），但由於歷史過程的複雜性，使得分析方式很難標準化操作，並侷限於探討較少量的樣本。

在「因果要素模式」的大量樣本／簡潔（parsimony）和「因果過程模式」的有限樣本／複雜（complexity）之間呈現的是一種抵換（trade-off）關係；要能分析大量樣本，又維持動態複雜的屬性，似乎很難兩全其美，所以關鍵在於立場的選擇。由前文關於問題意識的討論可以發現，歷史制度論者有興趣的課題和提問的方式多半切合「因果過程模式」的看法，既然選定了立場，也因此會有隨之而來的優缺爭論與陣營間對話的產生。但也因爲有此不斷爭論與對話的歷程，產生了使研究不斷完善的動力。

二、對量化挑戰的三種回應

儘管歷史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和提問方式多半切合「因果過程模式」的看法，但在回應量化陣營的質疑－「少量個案無法建立堅實因果推論」－時卻非鐵板一塊，只拘泥於質化方法的基本教義，反而出現了相當多元的回應方式：有重新界定何謂個案研究以直接回應「small-N」質疑的；也有主張效法量化研究設計，以提升質化研究嚴謹性的；當然也有站穩既有的質化基礎，對量化陣營的質疑不以爲然的。

註⑬　也因此 Charles Ragin 分別將質化與量化的研究稱爲「個案取向」（case-oriented）的分析和「變項取向」（variables-oriented）的分析。參見：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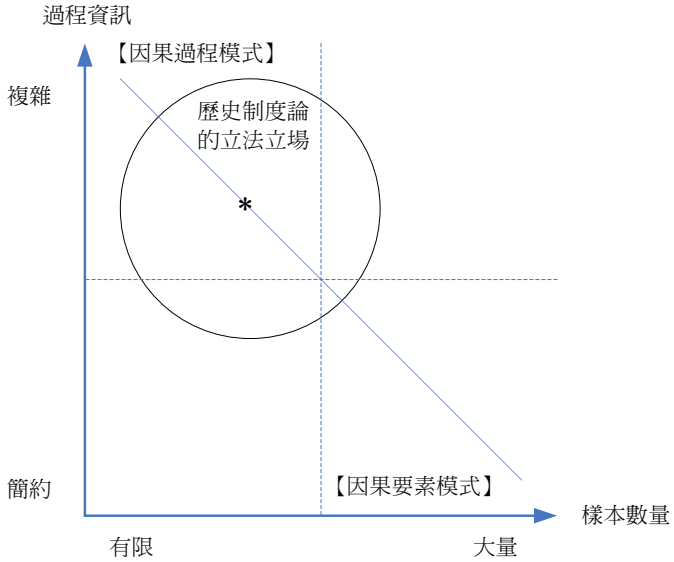

圖 2　兩種因果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首先，有部分學者的回應較爲中性，在不挑戰量化方法的根本邏輯下，指出一個重要但常被混淆的看法，即應區分「個案」(case) 和「觀察」(observation) 之不同。⑭在國家間的比較中，常將一個國家視爲一個個案，作爲比較的基礎，但這只考量了空間的因素。如果加進時間的因素，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表現出的特質未必相同，不應混爲一談，應將前後不同時期的國家視爲有所關聯但不同的個案。如果仍要將一個國家視爲一個個案，則不同時期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觀察，一個個案包含許多觀察，國家間比較應改以各個「觀察」爲基礎。

例如林文斌比較日本、韓國、台灣的金融體制改革，就將三個國家金融體制的形

註⑭　P. Hall, "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96. 此觀點在 Flyvbjerg 對個案研究五大誤解的說明文章中亦得到呼應。Gerring 對此有更進一步的闡釋，不僅將「個案」的性質放入一由「母體」(population)、「樣本」(sample)、「單元」(unit)、「個案」(case)、「變項」(variable)、「觀察」(observation) 等構成之體系加以界定，並同時考慮時間與空間的變異，區分出三種不同的個案研究 (case study)，而這三種不同的個案研究本質上都是某種比較研究。參見：B. Flyvbjerg,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 Research," in C. Seale et al.,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2004), pp. 420~434；J. Gerring,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2 (2004), pp. 341~354. 對個案研究更深入且全面的探討可參見：A. George and A.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J. Gerring, *Case Studies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David Byrne and Charles C. Ragi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ase-based Methods* (London: Sage, 2009).

成與發展按時間順序分爲三個階段，分別是 1950-1960 年代的形成期、1970-1980 年代的轉變期與 1990 年代以後的重整期，三個國家即產生了九個個案的比較基礎，既可進行國家內部的慣時性比較，又可進行國家間的共時性比較，大幅增加了理論建構的有效性。⑮

經過對「個案」與「觀察」的釐清，大大地增加了投入研究的個案數目，有助緩解 small-N 的質疑。在比較的過程中，可提供個案豐富的觀察資訊，尤其是因果過程的描繪與解釋，Hall 將之稱爲「系統性的過程分析」(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這是數據本位的統計方法難以達成的。⑯比較方法因此不再是統計方法不得已的替代方案，而成爲有其特色的研究策略。

其次，有些學者主張嚴謹的比較研究設計可資利用以解決 small-N 的問題。⑰將欲探討的個案中，造成結果的原因區分成「充分原因」(sufficient cause) 和「必要原因」(necessary cause)，⑱再運用比較研究的邏輯方法－「同意法」(method of agreement) 和「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⑲並搭配合適的分析技術，如布林代數 (Boolean algebra)，⑳就可在有限的個案中，得出有力且明確的因果推論。更進一步，如果所探討的變項可以從名目的衡量 (nominal measurement，即「有」與「無」的衡量) 進入等第的衡量 (ordinal measurement，即從強到弱不同等級的衡量)，甚至可運用更爲精

註⑮　林文斌，**日本、韓國、台灣金融體制改革的比較政治經濟分析**，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2007 年)。

註⑯　Hall, "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 391. 此種分析方法的進一步闡釋，可參見：P. Hall, "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 When and How to Use It,"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3 (2006), pp. 24~31. 另外，George & Bennett 則將此稱爲「有計畫的、焦點集中的比較」(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參見：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pp. 67~72.

註⑰　J. Mahoney, "Strategies of Casual Assessment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41~347.

註⑱　「充分原因」是指，如果此原因變項 (variable) 出現 (如武裝叛亂團體出現)，則結果變項 (如發生革命) 就會跟著出現。「必要原因」是指，如果此原因變項未出現 (如國家統治能力未下降)，則結果變項 (如革命未發生) 就不會出現；但如果此原因的變項出現 (如國家統治能力下降)，則結果的變項 (如發生革命) 可能會出現，也可能不會出現。參見：William R.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9), pp. 19~21.

註⑲　同意法是指，在一組個案中，每個個案在其他變項上均有所變異，但結果變項與原因變項卻共同出現；同意法有助於消除潛在的必要原因。差異法的操作和同意法相反，每個個案在其他變項上的狀態均相似，而結果變項與原因變項則共同出現或共同不出現。參見：Clark, Golder, and Golder,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p. 21~27. Przeworski & Teuney 早在 1970 年代就已提出類似的操作方法，將差異法稱爲「最近似體系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同意法稱爲「最差異體系設計」(most difference system design)。參見：A. Przeworski and H.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0), pp. 32~39.

註⑳　布林代數是一種運用變項間組合以推導因果關係的分析方法，有助於消除潛在的必要原因，得出充分原因。參見：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pp. 85~102；Daniele Caramani,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ith Boolean Algebra* (Los Angeles, CA: Sage, 2009).

確的分析技術，如模糊集合方法（fuzzy-set method），㉑更數量化地評估因果連結的強弱。

例如 Ragin 利用模糊集合方法探討 IMF 金援抒困的配套措施，何以在不同國家遭受到的社會抗議程度不同。他先將 35 國的案例依照社會抗議的強烈程度由強到弱分爲七等，再將解釋原因包括 IMF 給予的壓力、該國都市化的程度、經濟艱困程度、仰賴投資的程度、政治自由化的程度和政府積極行動的程度等由強到弱亦分爲七等，接著運用邏輯方法找出原因與結果間的強弱連結，就可篩選出三組容易遭致社會抗議的配套因素。㉒

在問題意識和有效解析歷史的初衷上，前一派和後一派的歷史制度論者殊無二致，但後一派的學者更爲傾向接受量化學派變項分析的研究邏輯，並致力於推廣適用於質化研究的分析技術，如布林代數和模糊集合方法等。「向量化研究取經」一直是質化陣營中重要的聲音，Mahoney 等人的主張反映了此種見解，其中最具里程碑性質的尤以 King, Keohane and Verba 於 1994 年的著作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爲代表。㉓

最終，仍然有不少學者站在傳統質化陣營的立場，強調個案研究所處脈絡的重要性。㉔實證論（positivism）的傳統觀點認爲應嚴格區分「發現脈絡」（context of discovery）和「驗證脈絡」（context of validation），且科學研究關注的是驗證脈絡。此觀點廣爲自然科學和許多方法論教科書所接受，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此兩者的區別並非如此的涇渭分明。檢證理論時如不考慮個案運作所處的脈絡（即「發現脈絡」），常無法得到堅實的因果推論，甚至會錯誤歸因。㉕

例如解釋東亞經濟奇蹟的重要觀點－「發展國家論」（Developmental State

註㉑ 模糊集合方法的分析邏輯近似布林代數，但更進一步可將布林代數只能二分「有」與「無」的類別變項轉換成從屬關係強弱的連續變項，此種分析技術亦稱爲「質化比較分析」（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可參見：Charles C.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Benoît Rihoux and Charles C. Ragin, eds.,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and Related Techniques*（Thousand Oaks: Sage, 2009）.

註㉒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pp. 261~286.

註㉓ G. King, R. Keohane, and S.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亦有許多質化陣營的學者反對此種主張，相關論辯的重要文章可參見：H. Brady and 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Oxford,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註㉔ Falleti & Lynch 賦予「脈絡」（context）一詞相當寬廣的定義，認爲脈絡是指（分析上、時間上、空間上、制度上）一組相關的設定，在此設定中，初始條件透過因果機制會（可能地）導致特定的結果。參見：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 "Context and Casu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9（2009）, p. 1152. 關於「脈絡」在政治分析中的作用，最完整的探討可參見：R. Goodin and C. Till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書中洋洋灑灑地將脈絡的作用分成哲學、心理、觀念、文化、歷史、地點、人口、科技等八大類。

註㉕ D. Rueschemeyer, "Can One or A Few Cases Yield Theoretical Gain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09~310, 312.

Theory）最早是來自 Chalmers Johnson 對於日本的個案研究。Johnson 觀察日本在二次大戰以後高速的經濟增長，認爲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對於經濟發展功不可沒，並於 1982 年寫成經典著作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㉖後續有些學者沿襲 Johnson 的觀點，但過於強調官僚的自主性（autonomy）與能力（capacity），因而備受不同觀點的學術陣營抨擊。Woo-Cumings 就指出，Johnson 的原意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探索日本政策制定者如此行動的意義，並非欲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架構，闡述國家角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㉗換言之，忽略時空脈絡貿然將理論過度延伸，很容易喪失解釋的堅實基礎。

個案研究除了檢證理論的適用性外，更重要的是解釋理論和建構理論的功用；對有限個案的深度探討有助於建構理論，統計方法常只是檢證理論。㉘尤其是許多歷史制度論者進一步認爲，在他們所關注的課題中，「small-N」的問題不只存在質化研究中，也存在量化研究中。因爲涉及特定歷史情境的個案根本沒這麼多，統計方法可能無用武之地；如果爲了擴充個案數，硬要將古今中外的個案融於一爐，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反而削足適履，混淆了脈絡因素，研究設計和因果解釋可能都有嚴重缺失。㉙

對脈絡因素的重視使得歷史制度論者大多傾向於建立「中程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認爲可針對理論的適用範圍和適用條件加以限縮或界定，而不企求如理性選擇理論般，或運用統計方法以建構放諸四海皆準的「大理論」(grand theory)。中程理論正是歷史制度論者從事理論建構的可欲目標。透過研究的不斷累積，學術社群內的共識與引導研究的共同分析架構亦會有長足的進展，這是不同於量化陣營的理論發展之道。

三、小　結

雖然歷史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和關注脈絡與過程的研究方式較爲符合「因果過程模式」，但面對量化陣營的質疑時，歷史制度論者並未墨守成規，拘泥於質化方法的基本教義，反而持開放的立場，提出多元的回應方式。之所以如此，和歷史制度論本質上是由經驗的問題意識所帶動的研究密切相關，只要能有效解答大問題和眞實世界的難題，各式各樣的方法都可一試。Thelen and Steinmo 將此理念稱爲學派內部共享的

註㉖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註㉗　Meredith Woo-Cumings,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註㉘　檢證理論的適用性即實證論所言「否證」（falsify）的作用。George & Bennett 指出，個案研究的優勢可分爲概念的有效性（conceptual validity）、導出新假設（deriving new hypotheses）和探索因果機制（exploring casual mechanism）三方面。參見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pp. 19~22.

註㉙　Rueschemeyer, "Can One or A Few Cases Yield Theoretical Gains?" pp. 325~326.

「歷史制度論者的研究規畫」(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roject)，而且是從學派奠基之初成員就已具有的共識。㉚歷史制度論者在方法立場上多元且開放的態度，不僅回應了問題意識的需要，更成爲推進理論發展的動力來源。

肆、理論建構：與理性選擇對話

在釐清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後，緊接著要討論此派學者如何從事理論建構的工作。如前文所言，歷史制度論者的理論與方法都源自於共同的問題意識，即探索大問題與解答眞實世界的難題，所以歷史制度論者建構理論的目標，即是透過系統性及脈絡性的比較分析與個案研究，歸納出有解釋力的制度理論以說明複雜的歷史過程，進而解答大問題與眞實世界的難題。例如比較各國曾經發生的革命經驗，歸納出歷史中大規模制度崩解與重組的過程，進而發展出有效解釋「革命」的理論。

另方面，在近期比較政治的領域中出現了「向歷史轉向」(historic turn) 的研究風潮，理性選擇學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㉛部分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對於探索歷史有著高度的興趣，但他們據以解析歷史的理論並非歸納於歷史，而是演繹自行動者理性計算並極大化其效用的假設，關注的是如何將其推導出的制度理論適用於特定歷史情境。例如在特定的某場革命中，行動者間的策略互動如何造成此次制度崩解的發生。

由此可見，儘管歷史制度論者和理性選擇學派都對探索歷史有興趣，但雙方研究的旨趣卻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前者關注的是如何解析宏觀的歷史過程，後者著重的則是如何探討特定的歷史情境。㉜雙方的差異基本上反映了問題意識的不同。歷史制度論者是經驗取向的問題意識，建構理論的目的是爲了探索大問題與解答眞實世界的難題，解析歷史過程成爲解謎的必要作法。歷史制度論者眼中的歷史過程充滿著大問題與眞實世界的難題，自然是動態且複雜的。理性選擇學派則是理論取向的問題意識，在既有的通則化理論基礎上，主要是利用歷史個案來檢證理論的適用性，關注的是對特定歷史情境的解釋。理性選擇學派眼中的歷史過程則由一個接一個的歷史情境所組

註㉚ K. Thelen and S.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 Steinmo et al.,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註㉛ 「向歷史轉向」的說法來自 T.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這股風潮也包含了理性選擇陣營的學者 R. Bates 等有關歷史的「分析敘事」(Analytic Narrative) 研究，和新制度經濟學大師 D. North 的經濟史研究榮獲 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參見 R. Bates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D.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註㉜ I. Katznelson and B. Weingast, "Interse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I. Katznelson and B. Weingast, eds.,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p. 5.

成，自然容易呈現靜態且線性的形象。在現今兩派學者都投入研究歷史，如何區隔雙方並能更有效的解析歷史，也成爲歷史制度論者建構理論的核心任務。㉝

一、歷史制度論：路徑依循與關鍵時刻

歷史制度論者爲有效解析歷史過程，採用中觀層次（meso-level）的「制度」作爲理論建構的主體。制度一方面是宏觀層次的文化與權力結構的具體呈現，又引導了微觀層次的行動者間互動，介於宏觀與微觀之間，具有分析上的彈性，因此成爲歷史制度論者理論建構的主體。歷史制度論者也深知歷史是變動不羈、複雜無比的，儘管制度具有分析上的彈性，但要發展出能全盤解釋歷史的制度理論恐怕仍然是過高的期待。歷史制度論者的應對之道多半是採取「中程理論」(mid-range theory) 的立場，並不像理性選擇學派的通則化理論般，尋求放諸四海皆準，而是賦予理論適用範圍的脈絡條件。換言之，歷史制度論者強調制度在特定時空下的作用，關注的是「脈絡中的制度」。㉞

以此認知爲基礎，理論建構的努力在於系統性地發掘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歷史過程是由一連串事件之鏈所構成，制度如何成爲其中承先啓後的機制，也就成爲歷史制度論者探討的重心。㉟歷史制度論者一般將制度的探討大別爲兩類：㊱一是「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 的研究，主要探討制度何以在歷史中能延續的問題；另一則是「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的分析，主要處理制度如何在歷史中被創設的課題。兩種分析各有長處，但彼此互補，共同構成歷史制度論一體的兩面。

註㉝　許多重要的歷史制度論文獻都致力於區隔兩者與對話，其中尤以 Thelen 分爲六個面向與理性選擇學派商榷，最爲系統性與完整，參見 K.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99), pp. 372~384.

註㉞　Pierson and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 706.

註㉟　McAdam, Tarrow, & Tilly 認爲「機制」(mechanism) 會帶來某種特定方式的改變 (delimited changes)，會在不同的情境中，用近似的方式，改變特定成分間的關係。Falleti & Lynch 進一步指出，機制的作用不能脫離脈絡而存在，在不同的脈絡中相同的機制能發揮的效果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關鍵在於「脈絡化的因果機制」(contextualizing casual mechanisms)。Pierson 則認爲由變項中心的因果法則 (casual law) 走向解析脈絡的機制分析，是探索歷史過程的一大理論進步。參見：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Methods for Measuring Mechanism of Content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 31, No. 4 (2008), p. 308；Falleti and Lynch, "Context and Casu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 p. 1152；P.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5~176.

註㊱　Thelen 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爲「路徑依循」是歷史制度論的核心機制，但涉及兩類不同面向的分析：一類是屬於「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的分析，另一類則是涉及「回饋效果」(feedback effect) 的分析。參見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p. 387~388；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pp. 220~222.

就路徑依循的相關研究而言，「路徑依循」的概念有寬狹兩種意涵。廣泛來說，指的是「歷史發生作用」(history matter)，發生在前的事會影響到發生在後的事。㊲但此種說法過於一般，沒有什麼分析上的指引作用。嚴謹而言，路徑依循指的是涉及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而使原有狀態不斷自我強化 (self-reinforcing) 的動態過程。在此機制啓動後，即使出現別種選項可供選擇，但由於轉換的代價太高，會使得特定狀態沿著既有路徑不斷延續下去。㊳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將某種權力或利益的安排藉由正向回饋的機制延續下去，形成特定的的歷史路徑。㊴

路徑依循的概念較早是由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開始運用，尤其關於科技產業的討論。㊵新制度經濟學的大師 North 將科技的特徵與社會互動的特徵並比，指出彼此有共通的特性；而規範社會互動有賴於制度，制度發展的過程亦會受限於正向回饋的作用，呈現路徑依循的特徵。㊶從經濟的領域轉向政治的領域，Pierson 強調由於政治場域的特殊性，包括：集體行動的本質、制度的高度密集、權力的不對稱分布和內部運作的複雜與不透明等，使得政治生活中也充斥著由正向回饋引起的路徑依循。再加上經濟學家認爲能矯正市場偏失的「競爭」(competition) 和「學習」(learning) 等機制在政治場域的作用亦不明顯，更使得維持現狀成爲政治常態。㊷

既然制度的作用在於型塑特定的歷史路徑，那特定路徑到底是何時開啓？制度所承載的正向回饋機制又是何時開始發揮作用？這就涉及第二類研究－有關「關鍵時刻」的探討。事件何時 (when) 發生，常會影響到其如何 (how) 發生。尤其先後發生的事件都有引發正向回饋的潛力，則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就很重要，後發生事件的

註㊲ W.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262~263.

註㊳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p. 20~21.

註㊴ Thelen 指出，有關路徑依循的各家看法中，以 Mahoney 最爲嚴謹，包含了結果的不可預測性、對初始條件敏感、權變事件無法排除、制度延續慣性等成分。但定義過嚴的結果使得許多歷史制度論者的作品都無法符合其界定。相較之下，Pierson 的看法較爲適中，大多數歷史制度論者的研究成果都呈現出制度創設期的有限創新和制度延續期並不排除改變的特色，都能符合其界定。參見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pp. 218~220；J.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 (2000), pp. 510~511；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p. 20~21.

註㊵ Arthur 認爲，經濟學家一向以來關注的是在「邊際報酬遞減」(marginal decreasing returns) 假設下，會導致單一均衡的經濟模型。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注意，經濟世界中充斥著不同於傳統教科書所言「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的現象，並由此導致偶然性的結果不斷延續的路徑依循狀態。參見 B.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最著名的例子，即鍵盤的「QWERTY」模式如何由打字機時代一直延續到現今的電腦鍵盤。參見 P.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1985), pp. 332~337.

註㊶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p. 7~8.

註㊷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 30.

作用很可能被先發生事件的影響所掩蓋，不同的事件順序，會產生不同的歷史路徑。㊸

雖然時機和事件順序的作用如此重要，但由於關鍵時刻常常具有高度的權變性（contingence），不易進行系統化的分析。所以儘管相關的經驗研究數量累積眾多，但針對「關鍵時刻」概念本身的理論化速度卻遠較「路徑依循」概念為慢，甚至連賦予一適切的界定都不容易。這些難題例如：關鍵時刻相較於之前或之後的時間點，其「關鍵性」該如何判定？既然稱為「時刻」，又該延續多長的時間範圍方為合適？這些困難之處，直到近期的研究才有效解決。Capoccia & Kelemen 認為：「關鍵時刻」是一段相對較短的期間，但當時行動者所作選擇卻根本地提高後續結果的機率。㊹關鍵時刻未必是指瞬時發生的事件，但其作用期間相較於呈現路徑依循的結果階段應該較短。而且關鍵時刻相較於之前和之後的時間點，當時行動者所做選擇對於開啓後續的歷史路徑，應該更具有決定性。㊺

二、理性選擇、制度設計與斷續均衡

分別從制度創設與制度延續的觀點建構理論，並藉此探討歷史的分析方式並非歷史制度論所獨有，理性選擇制度論亦有類似的看法。Shepsle 將理性選擇學派的制度研究分為兩個面向，分別是「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和「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的研究。㊻「制度均衡」關注的是制度的延續，認為制度產

註㊸　Pierson 將時機和事件順序的作用大別為三大類，包括：自我強化的順序（self-reinforcing sequences）、非自我強化的順序（non-reinforcing sequences）和歷史時機（historic conjunctures）的影響。參見 P. Pierson,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2000）, pp. 73~93. 但是 Thelen 在評論中指出，Pierson 在提及「自我強化的順序」時有「先來者具有優勢」的看法，但這是將正向回饋與事件順序兩種作用混為一談了，在分析上應予釐清。先發生的事件不見得產生長期影響力，端視其是否有引發正向回饋的潛力；重點在於正向回饋，討論事件順序才有意義。參見 K. Thelen, "Timing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2000）, pp. 101~108. 對 Pierson 此篇文章的其他討論以及作者的回應，尚可參考 R. Jervis, "Timing and Interaction in Politics: A Comment on Pierson,"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2000）, pp. 93~100；A. Bridges, "Path Dependence, Sequence, History, Theory,"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2000）, pp. 109~112；P. Pierson, "Dr. Seuss and Dr. Stinchcombe: A 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2000）, pp. 113~119.

註㊹　G. Capoccia amd D. Kelema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World Politics*, Vol. 59（2007）, pp. 341~369.

註㊺　Capoccia & Kelemen 甚至在文中提出了評估特定時間點關鍵性的量化公式。參見 Capoccia and Kelema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pp. 360~362.

註㊻　K. Shepsle,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H. Weisbe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56, 66. 在 Shepsle 近期的回顧性文章，將此兩面向用更為清晰的賽局理論方式呈現。參見 K. Shepsle,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30.

生之後，可規範行動者間的互動行爲，以產生一較佳的社會結果。正如 North 所言，制度就是人類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有助於達成彼此的交換與合作。㊼「均衡制度」則關注如何創設制度的問題，認爲制度來自於行動者間的互動，反映出行動者間策略互動的均衡。正如 Weingast 所強調，制度之所以有作用，因其對相關行動者而言是可信承諾，並包含了自我執行的誘因在內。㊽

理性選擇學派的制度理論演繹自行動者理性計算並極大化其效用的假設，很自然會從功能論的角度看待制度，將制度視爲人類有意的創設－或者制度本身反映出行動者間互動的均衡狀態（均衡制度），或者制度被利用以達成某種可欲的均衡（制度均衡）。歷史過程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引入制度（尤其正式制度）可增進合作，降低不確定性。Pierson 將此種出自「行動者中心功能論」（actor-centered functionalism）的觀點，稱爲理性選擇學派的「制度設計觀」（institutional design）。㊾如將制度設計觀運用於探討特定的歷史情境，在強大分析工作（如賽局理論）的輔助下，可能深具解釋力；但如將制度設計觀運用於分析長期的歷史過程，很容易產生過於簡化的線性觀點，這主要是由於制度設計觀的靜態本質使然。㊿

理性選擇學派將制度和所達成的均衡狀態間作了功能性連結，但建立此連結的前提是要先確定制度在均衡狀態中到底發揮了何種功能，但制度的特定功能不見得能長時間保持不變。一旦時間拉長，制度設計的初衷和實際發揮的功能間就可能脫節。換言之，當「均衡制度」與「制度均衡」中所呈現的均衡狀態未必是同一個均衡時，理性選擇學派對於歷史過程的制度解釋就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就時間的觀點來看，功能論式的分析本質上是「靜態」的，制度與均衡狀態間的連結並沒有特別考慮時間差的問題。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創設的初衷，是爲了維繫 Bretton Woods System 的匯率穩定，但到了 1980 年代以後，IMF 扮演的主要角色卻變成了在金融危機時的金援抒困。如果從 IMF 現在所發揮的功能去推斷當初創設的原因，很可能會發生錯誤歸因，忽略了現今的「制度均衡」（金援抒困）和原先的「均衡制度」（維持匯率穩定）之間存在時間落差的問題。

在看待歷史過程時，理性選擇學派深受「比較靜態」（comparative statics）分析方法的影響，習慣以各個均衡狀態爲核心，來比較達成均衡狀態的條件有何改變。(51)所以

註㊼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 1.

註㊽ Weingast, "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 p. 675.

註㊾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 104.

註㊿ 經濟學中一般將不考慮時間作用的稱爲「靜態分析」，考慮時間作用的稱爲「動態分析」。

註(51) 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28；Margaret Levi,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nd ed., p. 129.

理性選擇學派眼中的歷史過程，就是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均衡，並視均衡的達成爲常態，而均衡間如何隨時間演變的過程往往不是分析的重心。㊶許多學者將此種解析歷史的線性觀點具像化地稱爲「斷續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模式：㊸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行動者間的策略互動產生了制度，制度有助於均衡的達成或本身即反映了均衡的結果，發揮了路徑依循的作用，將特定狀態長期持續下去；打破均衡的力量往往來自制度外部 (exogenous)，此時又產生了互動與調整的關鍵時刻，新創設的制度再度將變動後的均衡狀態持續下去，直到打破均衡的力量再度出現。可參見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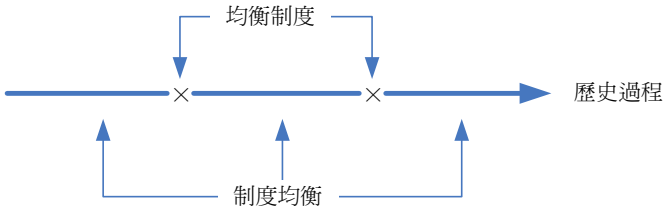

圖 3　斷續均衡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從線性的「斷續均衡」模式看待歷史過程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重組綜合」(realignment synthesis) 學派對美國政治發展的解釋。㊹此派學者認爲美國政治的核心是自由主義的信念，具有高度的共識，所以重大的美國政治變遷幾乎都是藉由「關鍵選舉」(critical elections) 的形式達成，不致於造成政治體制的崩解。所以美國政治發展的歷程，就是「關鍵選舉」造成體系調整、長期穩定、再次「關鍵選舉」進行調整、再度長期穩定等一連串周而復始的過程。

總之，理性選擇學派的「制度設計觀」針對特定時點的歷史情境而言，也許有強大的解釋力，但如果將時間流程拉長，就可能產生靜態的偏差，甚至誤導。㊺理性選擇制度論所衍生出的「斷續均衡」模式，雖然簡潔並富有邏輯性，但適用於眞實歷史過

註㊶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 381.

註㊸　此用語最早爲生態學家所提出，用於區別不同於 Darwin 觀點的生物演化過程。Darwin 認爲演化過程是緩慢、穩定且漸進的，但「斷續均衡」模式則指出長期的穩定可能會被短期突發的事件所打亂。Krasner 將「斷續均衡」的概念引入制度分析，用以描繪制度變遷的過程。參見 S. Krasner, "Sovereignt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1, No. 1 (1988), pp. 77~85.

註㊹　K. Orren, and S. Skowronek, *The Search for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0~62.

註㊺　理性選擇理論家 Jon Elster 亦採類似觀點，認爲賽局理論不是分析宏觀歷史過程的適當工具，將試圖結合兩者的「分析敘事」(Analytic Narrative) 稱爲「過大的企圖心」(excessive ambition)。參見 J. Elster,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3 (2000), pp. 685~695. 關於「分析敘事」方法，近期最完整的闡述，可參見 M. Levi, "An 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 to Puzzles and Problems," in Ian Shapiro et al.,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1~226.

程時，卻因觀點過於線性而深具侷限性，也引起了歷史制度論者的諸多批評。⑯

就制度本身而言，制度可能具有多重效果，制度選擇常是行動者間權衡和策略互動的結果，往往青睞制度的某些作用，並概括承受其他的副作用。但隨著時間流程拉長，尤其是外圍環境改變，制度的各項規範作用未必得到均等的延續機會，甚至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使原先受到重視的功能逐漸式微，反而意料之外或降低效率的作用不斷延續。這使得要由果推因，從制度功能的角度去推斷制度設計的初衷十分不易。

就行動者而言，制度設計者常是短視近利的，著重的是制度當下的規範作用，制度的長期結果往往是短期作用的副產品，並非制度設計時有考慮到的。而且隨著長時間的演變，即使制度的作用大體未變，但所規範的對象即行動者間的關係可能已發生改變，如政黨體系轉變，這都使得制度的功能論觀點不易成立。另方面，制度設計者的動機是否只是狹義的「自利」，還是另有服膺的特定社會、文化價值，自利和特定價值又是如何融合或並存，也須將制度設計時的脈絡因素納入考量，不應忽視。⑰

伍、歷史制度論的理論進展

在批評理性選擇學派的缺失之餘，一個更爲重要的課題應該提出：既然歷史制度論有關路徑依循和關鍵時刻的討論，與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制度均衡和均衡制度的分析，同樣都區分了制度延續和制度創設的面向進行探討，歷史制度論的理論建構是否也會如同理性選擇學派般流於線性簡化，以致無法有效解釋歷史過程？答案是否定的。歷史制度論從有別於理性選擇學派的兩個角度出發：從整體觀點以及從權力途徑探討制度，進一步開創出寬廣的理論空間，並發展出各種制度變遷模式的新方向。

一、制度研究的整體觀點和權力途徑

理性選擇制度論所衍生出的「斷續均衡」模式，很容易在兩個面向上偏離眞實歷史經驗。首先，「斷續均衡」模式描繪出的歷史過程常常呈現出「變」(change) 與「常」(continuity) 截然二分的局面：混亂與變動只會出現在制度創設期，等到制度出現、大局已定就會邁入穩定的制度延續期。其次，「斷續均衡」模式常常將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簡單歸因於外部衝擊 (exogenous)，無法提出內生性制度變遷 (endogenous)

註⑯ 抨擊最力的首推 Paul Pierson，將制度設計觀的限制 (limits) 洋洋灑灑地列了六大項，包括：制度有多重效果、制度設計者未必功能取向、制度設計者的短視、制度效果未可預期、環境改變與制度延續、行動者不延續的問題等。參見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p. 109~122.

註⑰ 此爲社會學制度論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的核心觀點之一。更多討論可參見 W. Powell and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M. Brinton and V.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Royston Greenwood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Sage, 2008).

的有效解釋。⑱

之所以如此，和理性選擇制度論主要著眼於個別制度的探討，並習慣對制度進行功能論式的分析密切相關。由於不考慮其他制度的影響，「斷續均衡」模式容易忽略了制度創設並非在真空中發生，行動者也並非不受其他制度的影響而有完全的選擇空間；即使邁入了延續期，制度的作用也非一成不變，總是不斷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情勢。考量制度創設期的「變中有常」，與制度延續期的「常中有變」，較符合實際的歷史過程。⑲

另方面，功能論式的分析具有靜態的本質，常理所當然地認爲關鍵時刻所創設的制度就能發揮路徑依循的作用延續下去。忽略了「均衡制度」和「制度均衡」這兩種均衡狀態其實存在著時間的落差，制度的作用和行動者的角色都可能發生改變，不應將兩者貿然劃上等號。在將兩種均衡狀態混爲一談之下，既然制度安排已達成了均衡狀態，行動者間欠缺片面改變的意願，顚覆制度安排的動力就只能歸因於外來衝擊，忽略了制度內部產生變遷動力的可能，也大幅減少了運用「斷續均衡」模式有效解釋歷史的機會。

相較於理性選擇學派習慣只針對個別制度進行分析，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困境，歷史制度論者則習慣從整個制度體系的角度出發探討個別制度，所見者爲「林中之樹」的完整景象，能有效說明「變」與「常」是如何在特定制度上結合。另方面，相較於理性選擇學派功能論式的分析流於靜態，無法有效說明制度變遷的方向與動力，歷史制度論者從權力的觀點探討制度，能清楚解釋制度變遷的方向與內生動力從何而來。

歷史制度論者認爲，制度的起源與變遷並非憑空發生，而是鑲嵌於整個制度體系的演化過程中。從個別制度走向整個制度體系，眞實的歷史過程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機制與制度，一項制度可能承載了不只一種機制，制度與制度間也會互相影響。在某一個歷史時點上，有些制度正在形成的關鍵時刻，有些制度還處在醞釀的長期過程中，其他的一些制度也許正在發揮延續特定狀態的路徑依循作用。在眾多制度交錯之下的歷史過程，成爲充斥著多元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偶然性（contigency）、慣性（inertia）與各式時機和事件順序並陳的樣態。⑳此種樣態即 Orren and Skowronek 所稱

註⑱　如何有效解釋內生性制度變遷是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努力方向，近期的成果可參見：A. Greif and Davi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2004）, pp. 633~652.

註⑲　W. Streeck and K. Thelen,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in W. Streeck and K. Thelen, eds.,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註⑳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 44.

制度體系內「交互並存」(intercurrence) 的狀態。[61]

從政體 (polity) 或制度體系 (institutional system) 的整體著眼，各項制度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時點、爲著不同的目的所創設，體系內存在多元且未協調的狀態，制度間常會有所牴觸和衝突，而制度創設的非共時性是其關鍵。常態下的政治是由多元且不協調的權威同時運作的，這種「行動中的多元秩序」(multiple-order-in-action) 現象就是「交互並存」，展現了政治的風貌如何在歷史過程中被形塑，也說明了制度變遷的動力常是源自體系內的不協調與衝突。[62]在其他制度持續不斷的影響之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從起源以降的任一時點，都同時結合了各種「變」與「常」的成分，無法在歷史過程中將兩者所處的階段截然二分。

要進一步探討「變」與「常」在不同時點的結合方式，歷史制度論者從權力的觀點看待制度提供了分析上的有力角度。從前文所言 Hall and Taylor 的類型學分析即強調，歷史制度論的特色是關注制度與權力間的關係，並認爲制度安排很大一部分是權力鬥爭的產物，體現了強者的正義與利益。制度也可以是不同陣營妥協下的產物，未必會清楚反映特定群體的目標。[63]所以打從制度起源開始，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就可能

註[61] Orren and Skowronek, *The Search for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113. 推究「intercurrence」一詞應爲 Orren & Skowronek 所創造使用，在一般英文字典中並不存在。兩位作者的使用脈絡，應和 intercurrent (併發的、中途發生的) 一詞有關。本文將 intercurrence 翻譯作「交互並存」。「交互並存」(intercurrence) 的用語最早出現於 Orren & Skowronek 於 1996 年發表的文章，他們在文中拉開了兩條論辯戰線，一方面和理性選擇學派的制度觀點進行理論對話，另方面則和以 W. D. Burnham 爲代表的美國政治發展「重組綜合」(realignment synthesis) 學派進行經驗對話。在抨擊了兩派的缺失後，Orren & Skowronek 提出了他們的理論見解－「交互並存」，並將此稱爲「歷史制度論的理論基礎」(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參見 K. Orren and S. Skowronek, "Institutions and Intercurrence: Theory Building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Nomos*, Vol. 38 (1996), pp. 111~146.

註[62] Orren & Skowronek 認爲「交互並存」的概念結合了歷史過程與制度分析爲一簡潔且單一的陳述，這是對歷史制度論最精鍊的表述，參見：Orren and Skowronek, *The Search for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113. 在 1990 年代初期，「新制度論」一詞正方興未艾之際，Orren & Skowronek 早在 1994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歷史制度分析在眾多新制度論中到底「新」在何處？關鍵在於特別意識到時間的面向，並進而體現在制度分析中。此外，一般的制度分析爲了探討方便起見，通常都是從單項制度或某個特定的政策領域著眼：Orren & Skowronek 的觀點和其他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自始的焦點即擺在整個制度體系 (institutional system) 或政體 (polity) 的層次上，強調體系的變動性和非協調性，以及制度間的交互作用。Orren & Skowronek 提出歷史制度分析的綱領包括：關注各項制度起源的非同時性、政治制度的外部性、制度的目的性與行動者的意向性，以及制度彼此間的交互作用等。由於他們的觀點與眾不同且富解釋力，成爲其後歷史制度論許多重要文獻引述的對象。參見：K. Orren and S. Skowronek, "Beyond the Iconography of Order: Note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L. D. Dodd and C. Jillson, eds.,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23~329.

註[63] Hall and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 938. 也有理性選擇學派的成員從權力的觀點探討制度，例如 Jack Knight 和 Terry Moe 等，但並非學派內部的主流觀點。參見：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Terry Moe, "Power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2 (2005), pp. 215~233.

存在緊張關係，並隨著彼此權力的消長，提供了制度變遷的動力與方向。由此可見，特定制度安排的存續很少是自動的（automatic）或一句「自我強化」（self reinforcing）就能簡單帶過的。既然權力鬥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動態成分就已植入了制度之中，這也就成爲何以出現內生性制度變遷的有效解釋。⑭

從權力的觀點探討制度，還要區別規則（rules）與服從（compliance）之間的不同。既然制度安排是權力鬥爭之下的產物，制訂出的規則就很難讓利害攸關的各方都滿意，因此不同群體對於規則的服從程度，從心服口服到陽奉陰違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規則本身又很難完全涵蓋眞實世界的各種複雜狀況，使得規則的執行一定存在有或多或少詮釋與裁量的空間，這也讓服從程度不一的各方持續進行角力，並不會隨著規則的訂定而落幕，而是繼續爭奪在執行面上的主導權。Mahoney and Thelen 因此建議把對制度的服從程度視爲一變項（variable）加以探討，從「規則」與「服從」之間落差的變化，就能看出制度變遷的動力強度以及可能的變動方向。⑮

二、制度變遷模式之探討

歷史制度論者從整體觀點和權力途徑探討制度。制度創設的非共時性以及制度體系的「交互並存」清楚描繪出，制度變遷的路徑就是不斷被其他制度所形塑的演化過程，不同的時間點會結合有不同的「變」與「常」成分。制度安排同時又是權力鬥爭之下的產物，規則與服從之間的落差從制度創設以降始終存在，除了外來衝擊會顚覆既有的制度安排外，內生性制度變遷的動力與方向也能得到有效的解釋。

歷史制度論者眼中的歷史過程，不會如同「斷續均衡」模式般流於線性簡化，反而將制度從創設到延續視爲一不斷調適與改變的動態過程。因此，進一步理論發展的方向，即是從「變」與「常」的不同結合，以及規則與服從的不同落差出發，在兩個極端之間－完全毀滅／重新創設 vs. 一成不變／完全延續，界定出各種不同的制度變遷模式。

藉由大量的經驗研究作爲基礎，歷史制度論者已歸納出數種制度變遷的模式，包括：「取代」（displacement）、「轉換」（conversion）、「層疊」（layering）、「漂移」（drift）、等，簡單說明如下。⑯

「取代」：移除既有的規則代之以新的規則。取代未必是立即、劇烈的改變，也可能是緩慢、漸進的過程，尤其是當引入新制度而直接挑戰了既有制度的作用時，取代會逐步發生。

「轉換」：既有的規則繼續存在，但被賦予新的詮釋和執行方式。轉換之所以出

註⑭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9.

註⑮　Mahoney and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p. 10.

註⑯　更爲完整的比較與討論，可參見：Streeck and Thelen,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p. 31.

現，主要是由於制度與現實之間產生了落差，行動者利用規則內部的模糊之處，重新運用既有的制度規範新的現實。

「層疊」：新規則被附加於既有規則之上，從而改變了既有規則的規範作用。既有的規則並未被移除，但新的成分逐漸累積之後，也可能根本地改變制度的作用。

「漂移」：既有的規則仍然存在，但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使其作用與規範的能力逐漸減弱。漂移的發生，源自於行動者並未回應環境的改變，積極保持制度的作用

如果參照這幾種制度變遷模式的內涵，按照對既有規則改變程度的強弱，可將其相對位置依序整理在由「變」與「常」所構成的光譜上，可參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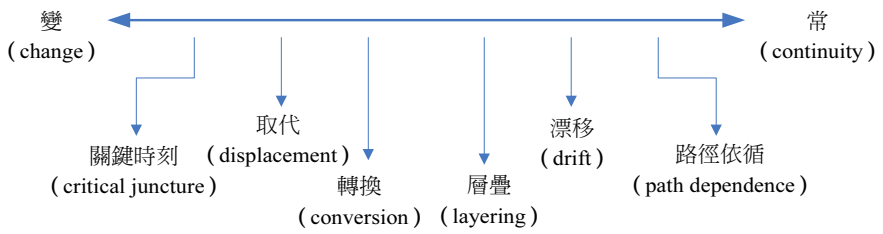

圖 4　各種制度變遷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例如 Schickler 就利用「層疊」的模式說明美國國會的制度創新。⑦美國國會基本的制度架構與職權皆源自美國憲法，在憲法的明文規範下很難作根本的調整。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國會內部乃密集地將新制度安排附加於既有的制度結構之上，或添加新成分以服務特定的時代目的。隨著國會不斷發展的結果，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國會遂呈現不同的風貌。

又例如 Hacker 用「漂移」的模式來解釋美國健保政策的演變。⑧制度的穩定與延續並不會自動發生，而需要努力的維持。當美國的福利體系疏於保障一系列新出現或不斷增加的風險時，美國公民所享有的社會保障就會顯著地緊縮，使得政策的有效性下降，此種改變在保守派執政時尤其明顯。疏於對制度的主動維持，久而久之即被動地讓制度走向衰亡。

針對這幾種制度變遷模式，可以從制度所處的政治脈絡，和制度本身的特質等兩

註⑦ Eric Schickler, *Disjointed Pluralis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Con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⑧ Jacob S. Hacker, "Policy Drift: The Hidden Politics of US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in W. Streeck and K. Thelen, eds.,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0~82.

個面向進行更爲系統化的分析。[69]政治脈絡是指偏好現狀的行動者，是否具有足夠的否決能力以捍衛現狀；否決能力越強，越能夠保持既有制度不被改換。制度特質關注的則是行動者在制度的運作過程中，所具有詮釋和執行的空間大小；空間越大，就表示制度的規範越不明確，行動者有越多的操作空間。將上述四種制度變遷模式分別放入由此兩個面向所構成的分類架構中，可參見表 2。

表 2　制度變遷模式分析

		制度本身特性	
		低程度的 詮釋與執行空間	高程度的 詮釋與執行空間
政治脈絡 特性	否決可能性 強	層疊	漂移
	否決可能性 弱	取代	轉換

資料來源：Mahoney and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p. 19.

在政治脈絡的特性中，現狀偏好者具有強大的否決能力時，既有的制度規則很難被廢除，利害攸關的行動者如果只有低度的詮釋與執行空間，意味著制度本身很難進行調整，此時制度變遷的可行之道，就是設法附加新成分於既有制度之上，就會出現「層疊」的模式。但如果此時行動者具有高度的詮釋與執行空間，代表制度本身具有相當部分的模糊曖昧之處，身處不利地位的行動者會設法規避制度的規範作用，久而久之，隨著環境的改變，如果又沒有積極維持制度的作用，就會產生「漂移」的變遷模式。

另方面，如果政治脈絡中，現狀偏好者並未具有強大的否決能力時，意味著變更既有的制度規則是可能的。此時利害攸關的行動者如果只有低度的詮釋與執行空間，既然不能對既有制度的作用進行調整，唯有引入新的制度規則，就會出現「取代」的模式。但如果行動者具有高度的詮釋與執行空間時，就不必費事引入新制度，只需要利用既有制度的模糊曖昧之處賦予新的詮釋與目標，就能舊瓶裝新酒，讓既有的制度持續發揮規範作用，此時產生的就是「轉換」的模式。

這四種類型並未窮盡所有制度變遷的可能性，只是歷史制度論者已界定出來的模式。在制度體系「交互並存」的狀態作用下，眞實的歷史過程也可能不只符合某種特定的制度變遷模式，而是多種模式的複合。進一步分析制度變遷模式，無論是從政治脈絡或制度本身特質著眼，強／弱、高／低的區分只是爲了分類方便，其間應該還有

註[69]　Mahoney and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pp. 18~22. 類似的分析架構 Paul Pierson 和 Jacob Hacker 也提出過，但他們是用制度所處環境與制度本身韌性（resilience）作爲分析面向，制度變遷模式的分類和 Mahoney & Thelen 也不盡相同。參見：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p. 155~56；Hacker, “Policy Drift: The Hidden Politics of US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p. 48.

很多種可能性與組合方式，何況還不只此兩面向可供探討。這些可能性在在都指出，有關制度變遷模式的理論建構，目前充其量只是處於初期階段，未來仍有寬廣的理論空間有待發展。從整體觀點以及從權力途徑探討制度，並發展出各種制度變遷模式，歷史制度論者已找出對眞實歷史過程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建構之道。

伍、結　論

從「新制度論」大旗於 1984 年舉起，歷史制度論發展迄今可謂二十年有成。歷史制度論是一問題意識、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三者緊密結合的學派。研究者始自經驗的問題意識，欲解答大問題與眞實世界的難題，並由此引導出特定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模式，但也遭到不同學術陣營的質疑和挑戰，在不斷論辯與對話的過程中逐步釐清學派的定位與發展之道。

在方法立場上，歷史制度論者遭到量化陣營的質疑。量化陣營不認爲歷史制度論者運用有限樣本能導出堅實的因果推論，但因果推論有效性的關鍵在於解釋模式的選擇。雖然歷史制度論者基本上同意質化研究的「因果過程模式」，並採取系統性與脈絡性的比較分析與個案研究以解析歷史。但歷史制度論者並未拘泥於質化方法的基本教義，面對量化陣營的質疑，反而持開放的立場並提出多元的回應方式。之所以如此，和歷史制度論本質上是由經驗的問題意識所帶動的研究密切相關。歷史制度論者在方法立場上多元且開放的態度，不僅回應了問題意識的需要，更成爲推進理論發展的動力來源。

在理論建構上，歷史制度論者遇到理性選擇學派的挑戰。雖然理性選擇學派功能論式的制度觀能簡潔有力地解釋特定歷史情境，但靜態的本質和專注個別制度的探討，使其對長期歷史過程的分析流於線性、簡化。相較於此，歷史制度論者基於「中程理論」的共識，從整個制度體系的角度以及權力的觀點探討制度，除了能說明制度創設（關鍵時刻）與制度延續（路徑依循）外，並結合「變」與「常」的成分，發展出多種介於其中的制度變遷模式，不僅能有效解釋宏觀歷史過程，更是解答大問題和眞實世界難題的理論利器。

*　　*　　*

（收件：98 年 6 月 19 日，接受：99 年 5 月 18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sung-hao Huang

Post-doctor Research Fellow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scho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tegrates research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 as a whole.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intend to answer "big questions" and to solve real-world puzzles, inducing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theory and method. In aspect of metho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agree on "causal process model"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es and analyze historical process systematically wit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quantitative researcher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are not constrained by the fundamentalism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offer plural responses. In aspect of theor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have consensus on "mid-range theory" and analyze institutions from holism and power approach. They combine element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to develop various patter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explain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effectively. Their patterns are not similar to the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which is too linear and simplistic.

Keywords: new i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rational choice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參 考 文 獻

林文斌，**日本、韓國、台灣金融體制改革的比較政治經濟分析**，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

林繼文，「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模式」，**政治學報**，第 32 期（2001 年 12 月），頁 61~94。

林繼文，「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叢**，第 25 期（2005 年 9 月），頁 67~104。

胡婉玲，「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6 期（2001 年 12 月），頁 86~95。

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政治學報**，第 32 期（2001 年 12 月），頁 95~170。

莊文忠，「制度的研究－『新制度論』觀點的比較與『後現代制度論』的發展」，**理論與政策**，第 16 卷第 4 期（2003 年 6 月），頁 15~44。

曾建元，「歷史制度論探原」，**世新大學學報**，第 11 期（2001 年 10 月），頁 195~206。

陳敦源，「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3 期（2001 年 8 月），頁 129~184。

陳敦源、吳秀光，「理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控遊說』：William H.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回顧與評述」，**政治科學論叢**，第 2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5~221。

郭承天，「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第 31 期（2000 年 12 月），頁 171~201。

謝俊義，「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與展望」，**中國行政**，第 68 期（2000 年 8 月），頁 1~26。

Arthur, Bri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Bates, Robert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Brady, Henr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Oxford, U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Bridges, Amy, "Path Dependence, Sequence, History, Theory,"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 (2000), pp. 109~112.

Brinton, M. and V.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Byrne, David and Charles C. Ragin, *The SAGE Handbook of Case-based Methods* (London: Sage, 2009).

Capoccia, Giovanni and Daniel Kelema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World Politics*, Vol. 59 (2007), pp. 341~369.

Caramani, Daniele,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ith Boolean Algebra* (Los Angeles, CA: Sage, 2009).

Clark, William R.,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9).

David, Paul,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1985), pp. 332~337.

Elster, Jon,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3 (2000), pp. 685~695.

Falleti, Tulia G. and Julia F. Lynch, "Context and Casu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9 (2009), pp. 1143~1166.

Flyvbjerg, B.,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 Research," in C. Seale et al.,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2004), pp. 420~434.

George, A. and A.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Gerring, John,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2 (2004), pp. 341~354.

Gerring, John, *Case Studies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Goodin, Robert and Charles Till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Greenwood, Royston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Sage, 2008).

Greif, Avner and Davi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633~652.

Hacker, Jacob, "Policy Drift: The Hidden Politics of US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in W. Streeck and K. Thelen, eds.,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0~82.

Hall, Peter, "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73~404.

Hall, Peter, "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 When and How to Use It,"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3 (2006), pp. 24~31.

Hall, Pete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ationalist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04~223.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y*, Vol. 44, No. 4 (1996), pp. 936~957.

Immergut, Ellen,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26, No. 1 (1998), pp. 5~34.

Jervis, Robert, "Timing and Interaction in Politics: A Comment on Pierson,"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 (2000), pp. 93~100.

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Kato, Junko, "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 Institutional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4 (1996), pp. 553~582.

Katznelson, Ira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Katznelson, Ira and Barry Weingast, "Interse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Ira Katznelson and Barry Weingast, eds.,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pp. 1~24.

King, Gary,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Knight, Jack,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Koelble, Thoma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7, No. 2 (1995), pp. 231~243.

Krasner, Stephen, "Sovereignt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1, No. 1 (1988), pp. 66~93.

Levi, Margaret,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41.

Levi, Margaret, "An 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 to Puzzles and Problems," in Ian Shapiro et al.,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1~226.

Levi, Margaret,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nd ed., pp. 117~133.

Lieberman, Evan, "Casual Inference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9 (2001), pp. 1011~1035.

Lijphart, 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Lijphart, Arend,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2 (1975), pp. 158~177.

Lowndes, Vivien, "Varietie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 Critical Apprais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74, No. 2 (1996), pp. 181~197.

Mahoney, James,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 (2000), pp. 507~548.

Mahoney, James, "Strategies of Casual Assessment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7~372.

Mahoney, Jame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 and Agenda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8.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7.

March, James and Johan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4), pp. 734~749.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Methods for Measuring Mechanism of Content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 31, No. 4 (2008), pp. 307~331.

McDonald, Terrence,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Moe, Terry, "Power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2 (2005), pp. 215~233.

North, Douglass,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ren, Karen and Stephen Skowronek, "Beyond the Iconography of Order: Note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L. D. Dodd and C. Jillson, eds.,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11~330.

Orren, Karen and Stephen Skowronek, "Institutions and Intercurrence: Theory Building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Nomos*, Vol. 38 (1996), pp. 111~146.

Orren, Karen and Stephen Skowronek, *The Search for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eters, Guy,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Pinter, 1999).

Peters, Guy, J. Pierre, and D. King, "The Politics of Path Dependency: Political Conflict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4 (2005), pp. 1275~1300.

Pierson, Paul,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 (2000), pp. 73~93.

Pierson, Paul, "Dr. Seuss and Dr. Stinchcombe: A 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 (2000), pp. 113~119.

Pierson, Paul,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ierson, Paul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pp. 693~721.

Powell, Walter and Paul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0).

Ragin, Charle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Ragin, Charles,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Rihoux, Benoît and Charles C. Ragin, eds.,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Sage, 2009).

Rueschemeyer, Dietrich, "Can One or A Few Cases Yield Theoretical Gain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05~336.

Sanders, Elizabeth,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9~55.

Schickler, Eric, *Disjointed Pluralis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Con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ewell, William,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245~280.

Shepsle, Kenneth,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H. Weisbe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51~82.

Shepsle, Kenneth,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3~38.

Stinchcombe, Arthur,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8).

Streeck, Wolfgang and Kathleen Thelen,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in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9.

Thelen, Kathle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99), pp. 372~384.

Thelen, Kathleen, "Timing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1 (2000), pp. 101~108.

Thelen, Kathle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8~240.

Thelen, Kathle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et al.,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

Weingast, Barry, "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pp. 660~692.

Woo-Cumings, Meredith,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1.